

泰國

文明搖籃中的青銅與彩陶

施慧明

一、泰國民族的形成

中國早期歷史上有三個民族集團，根據他們遷入中原的次序，可分為苗傜系、泰杼系、華夏系。若果將他們活動的事蹟，拿來與三皇的成就相對照，則大致可判斷苗傜系屬於伏羲氏，泰杼系屬於神農氏，華夏系屬於黃帝。當然，這樣說法，難免略帶有神話色彩之嫌，然而其中泰杼系就是後來形成泰族祖先的一部份，這却是毫無疑問的事實。

上述的泰杼系，昔時曾活躍於中國大陸西南地區，早在二三千年前，這些原始民族即生活在當地的山間或湖泊邊，已知磨製石斧、石刀與骨角器做為生產工具，還會燒製粗陶的烹飪器，用石紡墜紡線，用弓箭打獵。不久，受到華夏系的南移之壓力，迫使有部份泰杼族再向南遷移，他們沿著瀾滄江、薩爾溫江輾轉南下，抵達更豐饒肥沃的平原「黃金半島」(Suvarna Dvipa)，遂結集定居於此，進行拓墾，

甚至於製作高度的工藝品(例如陶、銅器等)。可是，有關這批距離現在二三千年以前的原始民族的存在或文化，猜測的成份佔多；事實情形如何，却是一片空白。

嚴格地說，泰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第八世紀開始，最早成為國家的便是以清邁為首都的「攬那國」(意為百萬稻田之國)，在中國的舊文獻上，唐人却稱它為「八百媳婦國」(當時邦主擁有八百個妃子，而每一個妃子領有一個寨)。這個八百媳婦國，留到後代之文獻資料不多，是相當未開化的時期，只知道直到十三世紀初還存在。據說元世祖曾想征服它，卻因路崎嶇而中途作罷。在泰國史前，境內除了上述攬那國以外，中南部為吉蔑人(現在柬埔寨人)的天下，建都現在的佛統府，其全盛期的勢力伸展到湄南河流域，併吞由暹斛族所建立之真臘國(今之華富里府)，北征消滅了「攬那國」。

在攬那國被消滅之後，吉蔑人的勢力仍不斷地膨脹，竟侵犯到「素可泰」(位在曼谷北方六〇一公里處)，威脅著泰族所佔據的整片地盤。及至公元一二五七年，泰族的勢力日漸強盛，終於把吉蔑人勢力逐出素可泰地域，最後立國建都，稱為素可泰(Sukothai)王國，締造

泰國七百多年之基業，通常泰國歷史即由此時開始寫起。

以上所述為國人一向的想法，也幾乎變成了一般的常識。可是，果真如此，則泰國的文明史會如同東南亞各國那樣，只有幾百年而已，空白的年代相當長，多達幾千年。可是到二十世紀初，泰國民族的正確發祥地在何處，學術界開始眾說紛紜，而史料却付之闕如；連攬那國是中國雲南一帶的泰杼系南下建立的說法，也開始動搖了。

據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一名荷蘭戰俘H.R. Van Heekeren被日軍派遣到泰緬邊境，參與修築「死亡鐵路」時，無意中發現了當地(泰西)的第一樁史前文化遺蹟，正確的地點是康查那布里(Kanchanaburi)省的班考(Ban Kao)，在那裡工作中意外地挖掘出些新石器時代的工具，接著，陸續發現了新、舊石器時代的洞窟與埋藏有豐富陶器與石器的墓穴。

在戰後，東南亞地區中，考古發掘工作最先進行，而且收穫最驚人的，首推泰國境內。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泰國東北部不斷地發掘到公元前三〇〇〇乃至四〇〇〇年以前的遺址，它們通常都有大量的古物出土：黑陶、彩陶、青銅器、玻璃珠等。

在東北部塵土瀰漫的高地中，由 22 號公路上的撒那空鎮，往西去一百多公里處的北方大約五公里的地方，有普魯村(Palu Village)，村子附近有目前轟動全世界學術界的文化遺址班昌，是世界文明史上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地。早在數十年前，班昌的人們在屋子四周挖掘時，已經習慣於撿到些陶壺、珠子甚至於人骨，只是他們未加理會，更不會去想像到太古時代人類的存在。

泰國在攬那國形成之前的原始時代的文化，逐漸地開始被揭開其神秘的面紗了。我們必須認識一個重要的事實：泰國民族除了少部份來自中國西南地區的泰捰族以外，另有已經住了數千年的原住民族，而且他們早就創造了高度的文明。

二、濃諾塔遺址的新發現

談起泰國對史前文化的考古調查，最早開始在一九六三年至六四年之間，首先，美國夏威夷大學的蘇恆翰教授率領的考古隊對泰國東北部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然後確定了三個遺址值得發掘。第一個進行發掘的便是，位在孔敬府(Khon Kaen Province) 普源縣的濃諾塔(Non Nok Tha)遺址，時在一九六五年至六六年之間。這個遺址屬於新石器時代，面積很廣大，多達十五平方公里，依據碳 14 的測定，上限在公元前 3590±300 年。

最值得注目的，是在這遺址上屬於公元前 3500~3000 年之間的文化層，出現了鑄造的青銅器工藝斧頭。鐵器時代則在公元前 1000~200 年之間。一九七〇年二月九

日，美國的「時代雜誌」首先公佈了這個發掘的消息，告訴世人，濃諾塔遺址的新發現，來證明東南亞的文化遠比以前大家所認識的古老多了。

過去許多學者一直認為東南亞地區是一個文化的絕境，它們的文化都是吸收印度或中國的外來文化而發展，東南亞對於世界古代文化沒有扮演過任何角色，可是，如今，濃諾塔的發掘，大量出現了青銅工藝品，大家的觀念不得不加以改變了，然而，這只是個開始而已，接著，仍屬東北部的最大遺址班昌，一經發掘以後，更是驚動全世界的考古界及藝術史學界。

三、班昌人的創意

班昌(Ban Chiang)位於烏董沙尼府(Udon Thani) 郎翰縣的一個橢圓形土丘上，最早的發現，面積大約在一平方公里。在二十世紀的現代，這個小村莊裡仍有住民四千多人。正如前面所說，早在一九四〇年代至五〇年代之間，班昌的村民偶而會發現到露出地面的彩陶片或完整彩陶罐，當時他們完全不知這些不起眼的粗陶是什麼人製造的，而未加重視。

一直到一九六三年，泰國政府藝術廳第七處處長查倫，將其中的一個罐子轉交給正在發掘濃諾塔遺址的蘇恆翰教授檢視，蘇教授認為這個陶罐上的螺旋紋大致與他正在發掘的濃諾塔遺址上出土的陶器紋飾相同，才引起泰國藝術廳的振奮。

一九六六年美國青年學者史蒂弗·楊在班昌從事社會問題田野調

查的時候，偶然看到一些繪有渦卷紋的彩陶破片後，大感興趣，便揀了幾片帶回曼谷，交于剛好前來泰國公差的美國國務院藝術顧問伊麗沙貝·萊安民，伊氏立即安排送了一些去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考古博物館，請求斷定年代。該大學利用新發明的「熱釋光法」進行測驗，最後斷定為公元前四六三〇年之物，比前面的濃諾塔遺址還要早一千年左右。

這個消息傳回到泰國藝術廳後，翌年（一九六七年）藝術廳便進行了三次小規模的發掘。一九七一年曼谷兩所大學也共同進行挖掘；一九七三年藝術廳又作了一次挖掘。從一九七四年開始至翌年，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與泰國藝術廳，共同進行了有系統的大規模發掘工作，尋獲一百廿三座墓葬遺址，所獲得的陶片五千多袋，器物二千多件，另外還有土壤標本、動物骨頭、木炭標本等，總共重達十八公噸，被運到美國，其中工藝品由賓夕法尼亞大學負責研究，人骨送到夏威夷大學，動物骨送到新西蘭大學研究（註一）。

其實，關於班昌文化的上限，距離現代大約有六千多年的消息，早在一九七〇年左右就在泰國的公眾中傳開了；於是曼谷的收藏家、古董商及美國人，都紛紛趕往班昌搜購具有數千年歷史的彩陶罐子，此種風氣變成了當時的流行。那些彩陶比起中國彩陶的年代要早上二、三千年，而且造形變化之多，實在不是中國彩陶所能與之相比美的。當時，台灣亦有專門跑南洋的古董商人黃君（暫隱其名）搜購了一些，帶回台灣，賣給收藏家（在一九七四~五年間），為數約有數十個（中國彩陶再遲了十年才到台

灣)。除此以外，他賣到日本東京博物館及奈良天理博物館與國立東京大學的數量亦相當可觀。依據筆者所調查，日本公家機構及私人收藏家手裡的班昌彩陶，幾乎都是當時黃君一人所提供的，雖然後來泰國方面亦發覺而嚴禁他的入國，然而他在日本却大受歡迎。

在一九七〇年代，歐洲與美國紐約等地公開展出的班昌彩陶，價格每件高達數千美元，可知其轟動的程度。不過，也因而促使住在班昌及附近村民們，點燃了偷挖遺址，盜賣彩陶之火，雖然這些是屬於他們的老祖宗所遺下來的珍貴原始藝術，照理應妥善加以保存才是。

四、班昌文化的斷代

上述的美泰雙方合作發掘期間，負責總策劃的學者將班昌遺址的文化層分為假設的七個時期（註二）。

第一期與第二期（公元前3600~2900年）主要的出土品，包括紅銅與錫合金的青銅器及陶器。此期陶器，大多胎器成形之後即加以用石頭研磨表面，使其光滑後再加以燒製，也有先加以刻紋裝飾，空百處再加磨光的，主要的是飲食器皿。青銅器的出現，表示了它們超過了世界上任何國家的青銅器的年代。

第三期（公元前2000年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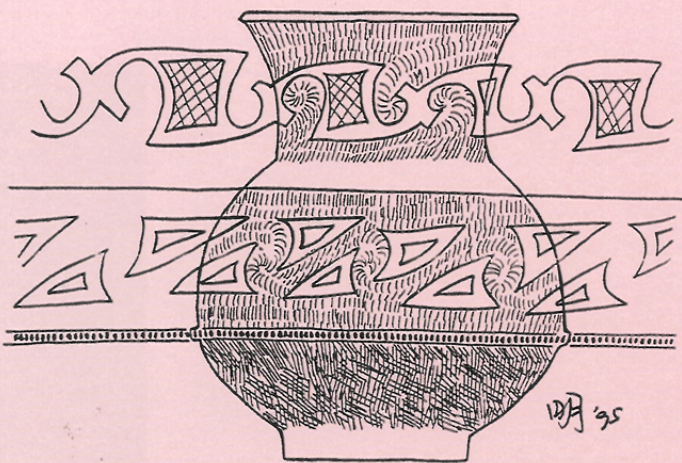
主要出土物，為由弧線刻成的較大繩紋陶器。

第四期（公元前1600~1200年）在彩陶出現之後，鐵器也相繼發掘，由此，可以獲知此時東南亞已經有冶鑄鐵器的技術，遙遠地超過了過去學者們公認的，亞洲的鐵器在公元前第二世紀出現在中國的時間。此期出現的彩陶多達數千件，胎土以淺黃透紅色為其特徵。

第五期（公元前1000~500年）與第六期（公元前300~250年），出土了大量的粘土捏製的小動物模型、玻璃珠、磨石珠、青銅耳環、手鐲、足鐲及胎土略帶黃味的加彩陶器。此期班昌玻璃珠的出現，與中國玻璃珠出現在戰國時代相比較的話，從時間上而言，若不是更早



圖一 班昌黑陶 廣口長頸瓶



圖一之展開圖

了幾百年就是幾乎在相同的時期出現，這樣的結果使我們感到驚異。因為大家一直認為世界上，玻璃雖然是早在四千多年前最先出現在中東的亞述、巴比倫一帶，可是在東方是中國最早出現(二千多年前)，可是，這個說法幾乎快要被推翻了。

第七期(公元1600~1800元)，已屬近代，因其出土品較無特殊意義，在此從略。

另外一方面，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的體質人類學家邁克兒·比特魯修斯基教授，將班昌發掘到的一百廿三具人體骨骸作了分析，然後發表其結論說：史前的這些班昌人，壽命估計約三十一年，身材中等，肌肉發達。身體似未曾受到傷害，可以判斷當時他們的生活是相當安祥的(註三)。

從這個報告可以確知：古代班昌人在形態與體質上，與其他東南亞各地的史前種族(尤其是中南半島或現今印度尼西亞人)是非常相似的，只是現在的居民們比較長壽些。

上述的夏威夷大學教授蘇恒翰，對於班昌文化的新發現，連續撰寫了許多論著：《東南亞史前史重述》、《泰北、東南亞與世界史前史》、《東南亞史前史的新觀念》、《東南亞地區的史前陶器》等，在在都強調東南亞在世界古老文明史上的重要性。

不過，每當一種新資料或新發現，要讓多數只擁有舊資料及老套觀念的人去快速接納甚至加予承認，本來就有著不少障礙。其間必定會產生不少爭議。圍繞著濃諾塔及班昌遺址出土品的斷代問題，便是最好的一例。

美國新西蘭奧他古大學教授海奧姆，根據他在班昌附近一個遺址(註四)從事發掘後所作的論證：包括班昌、濃諾塔等泰國東北部一帶地方的青銅鑄造，應推定為公元前二〇〇〇~一五〇〇年之間較為妥當(但他對陶器的年代並未表示任何不同看法)。這個論調後來竟被英國出版的「考古學辭典」採用，云：「從目前發掘情況而言，過去(筆者按：應該是指蘇恒翰之說而

言)所說的鐵與彩陶出現的時間約提早了一千多年，而且公元前一五〇〇年以前的真正青銅器仍不很清楚」(註五)。

話雖然這麼說，但夏威夷大學從事的調查，已經大大地改變了人們對東南亞史前古老文化的看法，明確地可以判斷的有二：

首先，班昌或濃諾塔遺址的發掘最重要的學術資訊，就是許多泰國現代生活中非常普遍的習俗，諸如種稻、飼養家畜(水牛、豬、狗)及家禽(雞、鴨)，甚至於製陶工藝等，可以在四千多年前的古老傳統中尋到其根源。

其次，濃諾塔與班昌遺址出土的青銅器，表明了史前泰國的冶金工業早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便已達到了相當複雜的程度。而且從班昌出土的青銅器發現，他們當時已經懂得利用銅與鐵製造合金了，這是世界文明上的一大創舉，所以可以說世界的青銅器時代，可能始於東南亞。總之班昌文化相當重要，它不僅是泰國文明的搖籃，也是亞洲文明的搖籃。

五、泰國東北部為文明的搖籃

濃諾塔人也好，班昌人也好，從出土文物觀察，則可知古時候他們均經營著漁獵兼農業的生活，正是典型的古代農耕民族。班昌遺址的發掘，間接地證明了濃諾塔遺址發掘品分析結果正確無誤，更改變了亞洲青銅器唯一的發祥地，是在三千多年前的中國北方的錯誤論斷。而且他們還創新了世界記錄：除了青銅器以外，他們還發明了不容易生鏽的銅與鐵的合金。



圖二 班昌黑陶 廣口大鉢

六、班昌陶器與銅器之特色

無論泰國東北部遺址的正確斷代如何，這些出土的工藝品，是屬於原始藝術的一種無誤，在此略述筆者個人對它們研究後的一點淺見：

第一、在二十世紀之中，東南亞及其鄰近區域內，迄今已經發現了三個重要的青銅時代文化：越南北方的東山文化、中國西南地區的石寨山文化和泰國東北部的班昌文化，而這些文化的地區，不但互相鄰近，而且它們之間均出現銅鼓的存在（惟班昌的銅鼓，體積奇小，其它兩種文化的銅鼓却很大）（註六）。其次，三者都有形制相似的鐘、斧、矛等青銅器。若果硬要尋找它們之間的差異點，可以說：東山文化的青銅器在造型上較少變化而且單純，器體上的浮雕花紋比較平面。綜觀東山文化的銅鼓，便很

容易瞭解到這一點。石寨山文化的青銅器，內容複雜造型多樣，連銅鼓或銅鼓形貯貝器上的紋飾，都是工藝手法精湛的立體造型（例如：青蛙、象、田螺等物），而班昌的青銅器形制均為較小，而且紋飾也比較簡單樸素。

比這些差異尤為重要的一點即是：東山文化與石寨山文化二者，都至少看得出受早期漢人文化的影響，然而班昌文化却無法看出有漢人文化的影響。這似乎說明著班昌文化在某些方面，提供了早期東南亞青銅器特有的傳統面貌，比其他兩個重要地區更明確的事實。

第二點：班昌遺址從最底層至第六層，均有陶器出現，有黑陶或彩陶（註七），不過其中最具藝術價值的就是彩陶。這種彩陶是燒成陶器後，用礦物質顏料（朱色）溶解於水中，塗畫在陶器上的，色澤比中國彩陶的（接近咖啡色較多，類似朱色者極少）還鮮艷。發掘時，也有陶壺旁邊尚殘存著朱紅色顏料（塊狀）。若與中國彩陶相比較，則可以發覺班昌的體積雖然比較小

（極少數體積較大者），然而器形頗富變化，所繪紋飾，線條亦比較細緻，中國彩陶上線條，較之粗獷多了。

第三點：悠久的班昌文化之中，依我個人的觀察，可以稱得上屬鼎盛時期，似乎是第四、五、六期，也就是公元前二〇〇〇年至二五〇年之間。因為世界各國的工藝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或部族）的藝術品之精美與否，與其國家（或部族）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有密切關係。事實上，班昌古人在這一段時期所創作的黑陶（圖二、三）彩陶（圖四、五）、小動物泥塑像、首飾用玻璃珠、首飾用磨石珠，及各種青銅製身體裝飾用品（例如手鐲，圖七）或青銅武器（例如戟，圖八）等，頗為精緻。這些都是泰國代表性原始藝術品，而且此段年代所出土的數量尤為可觀。

第四點：從早期的黑陶或第四期始出現的彩陶之中，帶有圈足者不少，壺罐部份也好，圈足部份也好，都是手捏成形的，當時未用陶車，也因此壺罐的器身與圈足並不是一體成形，而是兩者分別成形後再加以連接而燒成的，也因此少數出土品有器身與圈足容易脫接的現象（圖四，此器便是一例，出土後不久即脫接，現已再加粘接修復），不過值得注目的是這些分別捏成的圈足的造形都相當精緻，有的幾乎不遜於田陶車迴轉而成形的。

第五點：班昌文化中的青銅器，出土的情況較差，因為如同一般歷史悠久的古墳，陶器的出土狀態較為美好，而大多金屬器因腐蝕，難見其準確而完整的造型，所以筆者現在僅以青銅手鐲（圖七）及鳥頭形青銅武器（圖八）為例，說明其造型設計的精緻度。首先此



圖二之展開圖

手鐲比中國的同質手鐲小(外圈直徑 6.8 cm,內徑 5.5 cm),而且鐲環上設計有一縫隙,以便手掌伸穿時可以伸縮之用。若以近代人或現代人的眼光看之,並非什麼特殊的表現,然而在公元前一千多年乃至數百年期間的原始時代,竟能作這種現代人所謂「機能主義設計」(Functional design),不由得令人感到驚異。這種有縫隙的青銅手鐲,在中國青銅史上,出現得比較晚。

其次,鳥頭形青銅武器,該是矛或戟的一種,因為頭部扁平而很銳利,並在一側帶有小鈎,形如鳥嘴(與中國所謂戟者略有不同),班昌出土的這一對戟,造型上顯得非常「秀氣」,與春秋戰國時代出現的中國銅戟的厚重造型,大異其趣,也是一種相當精緻的鑄造。(按:

此器長度不明,然而頭部寬度 46 cm,頸部約 3 cm。這一類銅戟的頭部,有的在正中央有一小凸起圓圈如同眼睛,所以稱它為鳥頭形式武器是很妥當的。)

七、班昌黑陶的紋飾

有關班昌文化中的黑陶的紋飾,擬在此略作探討:

首先,第二期的灰黑陶器,器體上表面不是曾經加予磨光處理後才加熱燒製(變成無紋素燒陶器),就是先刻花紋後磨光空白處,才燒成的(圖一,當然是露天燒造)。凡經過用石頭磨光處理的表面,燒成後都顯得光滑優美,這是其它種族

早期陶器中所少見的。此器可稱為「廣口長頸瓶」,高度 26.2 cm,口徑 20 cm,腰徑 20.7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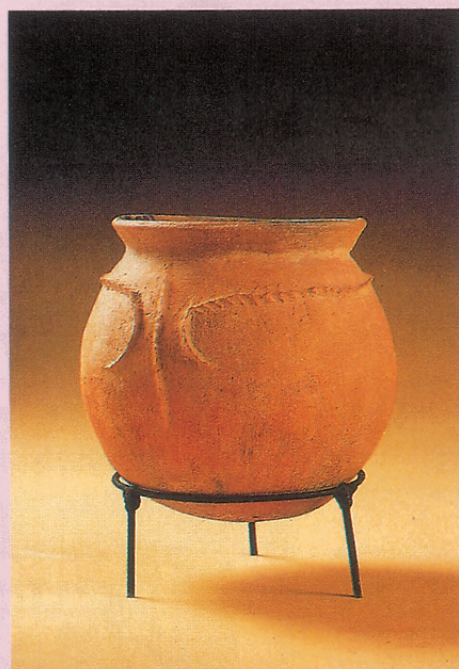
至於班昌黑陶器上的雕刻花紋有些什麼呢?

若以圖一與圖二為例,則均為二方連續圖案的帶狀裝飾紋,也就是一種單獨圖案的重複排列。例如「廣口長頸瓶」的頸部或肩部,均採用二方連續圖案,祇是其單獨圖形,究竟代表何物或象徵什麼,都無法判斷。

另外一件灰黑陶器(圖三)的腹部裝飾,也是一種典型的二方連續圖案,其單獨圖形也是無以名狀,勉強以現代用詞說明的話,它們也是一種極具變化性與多元性的幾何學圖案,比起呆板而單調的現代幾何學圖形藝術性更高。此器的口徑 16.2 cm,腰徑 16.5 cm,高度



圖三 班昌黑陶 撇口罐



圖四 班昌黑陶 繩紋罐

16.5 cm，筆者暫時將它取名為「撇口罐」。

「廣口長頸瓶」也好，「撇口罐」也好，它們身上的花紋均是用較細的刻線形成的，可是值得注目的，是除了上述的幾何圖形為主紋以外，還刻上較粗的短線作為地紋相配襯。「廣口長頸瓶」的圈足除了素而無紋以外，在瓶頸、瓶腹都填滿了長約一、二公分的較粗刻線。「撇口罐」是頸部與圈足素而無紋以外，肩部及腹部均佈滿曾經利用八齒形櫛刮過的許多平行線痕跡（長度約1~3 cm）。乍看之下，常會誤以為是帶狀紋。

總之：班昌灰黑陶上的裝飾紋，相當豐富而且至為富於藝術性，使我們不禁欽佩幾千年前班昌人的繪畫裝飾能力。可是，除了這些藝術性裝飾紋以外，筆者也在班

昌黑陶中發現一些宗教性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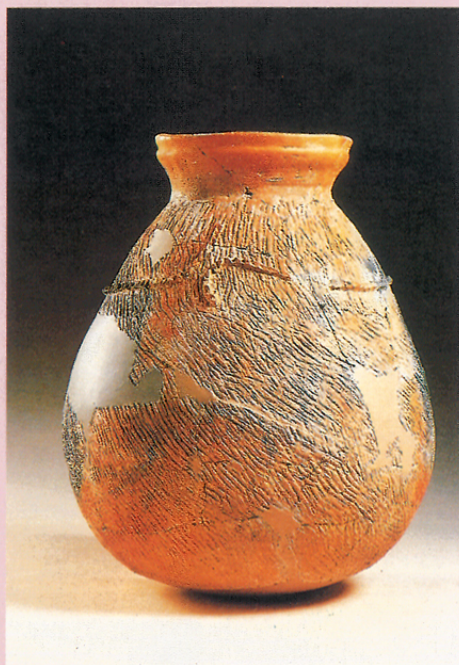
圖二是一件「廣口大鉢」，底部附有一小型圈足，高度12.2 cm，圓徑17 cm，腰徑19 cm，器皿表面上也是佈滿齒形櫛刮過的平行線痕跡（長度約2~3 cm），可是，特別引人注目，是此鉢的腹部底近腰處，加配了一圈的繩形狀貼花紋（以後簡稱「繩紋」）。此一繩紋照理應該繞著腰周一圈始符合製陶慣例，然而仔細觀察却可發覺此一「繩」圈却有缺口，而且缺口的一端水平，另外一端却如同抬起頭首的蛇那樣（可以看作眼鏡蛇抬頭時之側面狀），伏蓋在水平的另外一端繩紋上面。

這是個非常不尋常的貼花紋，若果說它是未燒前的陶土器皿上要貼上此繩紋時，不小心弄斷而產生缺口的話，則不應該繩紋的一端長

度超過另外一端，長達將近5 cm之多。若說它的這種缺口並無任何意義或意圖，實在無法讓人首肯。

國立班昌博物館也收藏一件類似的「繩紋陶器」，可見這種貼花紋並非少見的「意外」（圖四）。博物館標示其製造年代為（2000~1000 B.C.）。該館另外一件（圖五）則標示年代為（2000~1500 B.C.）。

筆者走筆至此，不由得想起美國新墨西哥州等西南地出土的，昔時印地安紅蕃古墳中出現的許多伏蓋在死者臉孔上的陶盤，幾乎都是曾經經由巫師做法時故意鑿破小洞的事實（註八，圖六）。迄今尚無人可以明確地指出其鑿破的含意何在。筆者同樣地相信，班昌黑陶上出現的這個貼花繩紋在故意做的缺口，表示此器（不祇一件）必定為供巫師專做某種咒術時使用而製作



圖五 班昌黑陶 繩紋壺



圖六 美國西南地區紅蕃陶鉢（經巫師作法鑿破一孔，蓋在死者臉上）

的。

八、班昌彩陶的紋飾

依據班昌發掘報告，均註明彩陶的出現，始於第四期（公元前1600~1200年），此期彩陶的主要紋飾是渦卷紋（圖七、八），而較先前被發掘的濃諾塔遺址出土的彩陶紋飾之中，亦有此類渦卷紋，可知兩個遺址的幾千年前文化，是屬於伯仲之間關係（渦卷紋繪在大型器物時，幾乎大到蓋上整個腹部程度。）

彩陶上的紋飾除了上述渦卷紋最多以外，其次是另一種類似波狀紋的「屈伸蛇形紋」（註九），圖九

器皿上的連續花紋便是一例。或許有人看到此紋便會不假思索地主張它應該是波浪紋，然而筆者多次前往中南半島各地，早就對於當地各種有毒無毒的大小蛇類出沒之多，大感驚異。在二十世紀的現代是如此，在幾千年前未開化的太古時代，牠們對班昌人的加害程度，絕非我們現在住在台灣的人們所能想像的，所以，他們製造的陶壺陶罐上出現蛇紋，亦不是什麼特別新奇的事。回想台灣排灣群族（包括排灣族、卑南族、魯凱族），以及過去的最高神壺（僅大頭目始擁有，如今祇在台大考古資料館、中央研究院及台灣省立博物館等處各珍藏一兩個而已），在壺身上亦有蛇紋之線刻或貼花紋，那是一種他們至高祖先（百步蛇）的象徵；擁有此壺者即代表在部族中最高地位的繼承

者。除此以外，排灣群族亦將蛇紋綉在男女衣服上或刻在木器上當裝飾，甚至於過去相信它們有吉祥意義存在。總之，在南島語系的未開化民族或原住民族，愛用蛇紋當器皿或衣服裝飾，是極其普遍的現象。

筆者所以主張要稱這種紋飾為屈伸蛇形紋，除了上述理由以外，尚有重要的一點是：此種連續性蛇紋的上面與下面，均有格子紋為地紋；若果它是表現波浪紋的話，通常波浪上面會留下空白表示天空，是一般繪畫圖案的慣例，又，若是波浪紋，則無需使用雙線來鈎勒。倘若想像著一條在地上的蛇，連續屈伸著身子往前爬行的狀態，再來觀看此紋，必有很多人會表示同意。

在比較小型的班昌彩陶罐或彩



圖七 班昌彩陶



圖八 班昌彩陶上最常出現的渦卷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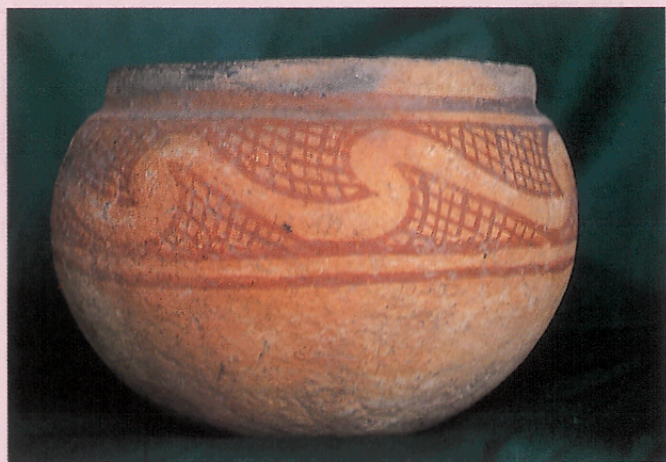
陶壺上出現較多的花紋，為圖二、三的一種簡單的曲線紋，此紋雖簡單，可是線條流利而頗有動感。筆者看到這種線條，忽然想起台灣原住民魯凱族早期用在男女衣服上的蛇形線，覺得兩者雖然並不完全相似，但「變形便化」的方式却相同；此紋也是採用雙鈎線，表現得非常富於奔放感，將這種紋飾解釋做曲折的蛇形紋，似乎並無不妥當之處，除此以外，目前並無其它更好的說法。

除了筆者認為是蛇紋的彩陶以外，還有一些是幾何學圖形彩陶或幾何學圖形與蛇紋混合者，圖三為國立班昌博物館收藏品，便是屬於兩者的混合紋，年代較前述三件晚，標明為 300 B.D.~200 A.D.。

在此附帶一提的是班昌遺蹟除了古陶以外，從 3600~400 B.C.之間，均製精緻的青銅武器（圖三、四）與手鐲（圖五）在 300 B.C.~200 A.D.之間出現藍色、綠色玻璃珠子（圖六）。

九、與中東兩河流域文化媲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歐美各國考古學家們在中東兩河流域從事多次發掘，終於在現代的約旦與伊拉克及敘利亞境內，多處發現到公元前七〇〇〇年（距今九〇〇〇年）前的遺址，證明巴比倫人與亞述人當時已經產生了高度農耕文化；他們栽培大麥與小麥，同時飼養著山羊與綿羊。這被視為世界上最早出現的農耕文化，其年代之早，打破戰前預測的年代甚多，驚動學術界。



圖九 班昌彩陶（屈伸蛇紋）



圖二 班昌彩陶（圖九蛇紋之放大）

可是，在泰國繼濃諾塔與班昌兩大古蹟的發掘而引起軒然大波後，近十多年來，美國考古學家們又在泰國東北部各地，繼續從事發掘工作而有諸多斬獲。最重要的，是他們在班昌遺址的西邊，發覺到公元前一〇〇〇〇年（距今一二〇〇〇年）前的巨大石灰石洞窟，是原始民族曾經居住過的；從諸多出土品的碳 14 測驗，證明他們在公元前七〇〇〇年左右開始過著種稻的農耕生活（按：中國種稻始於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上海附近有其遺址），正是班昌文化的老祖宗。如今，世界學術界，依據現有的資料，不得不承認在年代上泰國東北部的史前文化，可以與中東兩河流域形成的文化比美，前者是人類文化史上最早的種稻民族，後者是最早的種麥民族，而前者的發掘與研究仍然還在進行之中。

類似班昌的遺址，在泰國東北

部分佈的區域，比早期預測的大了許多，所以美國與泰國的文化人類學家，最初提出了「班昌文化遺蹟」的概念，可是，近幾年來有人更進一步提出了「班昌文化區」的概念，是令人首肯的。同時，我們似乎也到了不得不承認：青銅器時代可能始於東南亞，而種稻的農耕文化亦復如此，不過最後也要順便一提的是班昌人在第三世紀開始，被侵犯進泰國的吉蔑人所統治甚至於被消滅。



註釋

註一 本章有關班昌文化發掘經過，係參閱展覽圖錄〈Discovery of a Lost Bronze Age, Ban Chiang〉1982。

註二 見夏威夷大學發行之考古刊物〈探索〉（十八卷十四號）1976。

註三 見夏威夷大學考古刊物〈探索〉（班昌文化專刊）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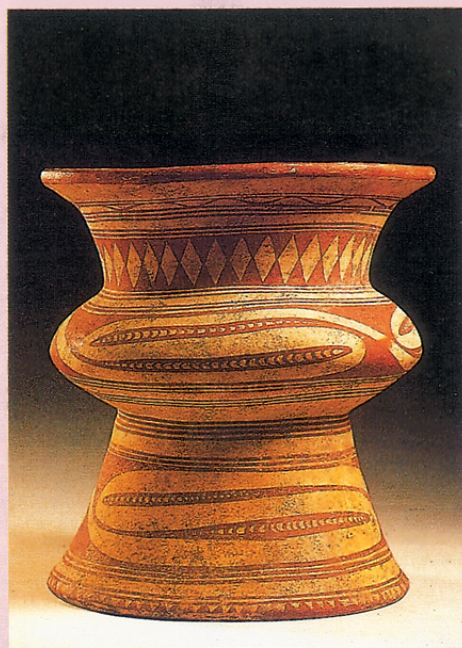
註四 班昌遺址後來經過多次試掘，發現其包括範圍至為廣大，它不僅是一個定點，甚至於可改稱為「班昌文化區」遺址的地步。

註五 見英國馬克米蘭 (Macmillan) 編著「考古辭典」(Dictionary of Archaeology) 上「班昌」案。

註六 銅鼓為一種東南亞地區獨特的青銅器，其造型演變：其雛形如同大型銅鍋，底部為半圓球形，初為部落之共同炊器，後來逐漸變為兼警報器之用，故其底部由半圓球形逐漸傾向於平底形，用途亦開始由早期的炊器變成純粹戰鼓或警報器。世界考古學界一致認為其發祥地在中南半島及中國西南地區之間，範圍甚廣，在中世紀還由中國西南地區傳至華中、華北。筆者除在上述地區以外，還曾經在印尼之巴厘島、蘇門答臘島等地看見過。



圖二 班昌彩陶罐上的蛇紋具有動感



圖三 班昌彩陶（幾何圖形與蛇紋混合）用色非常艷麗

註七 見夏威夷大學考古刊物〈探索〉(十八卷十四號) 1976。

註八 見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美育〉第三十一期一月號 1993,拙著〈美國西南地區的印地安古陶〉。這些古陶係公元一〇〇〇~一一五〇年之物,在新墨西哥州西南Mimbres Valley出土。

註九 此名稱為筆者之試稱。



圖三 班昌青銅器 鳥頭形戟



圖五 班昌青銅器 (手鐲)



圖四 班昌青銅器 (武器兩種)



圖六 班昌玻璃珠 (300B.C.~200A.D.)